

胡 适 评 传

耿云志 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发行所 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20 插页 5 字数 465,000

1999年7月第1版 199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7-5325-2543-0

K·284 定价:32.60元

目 录

撰稿人

第一编 综论

1. 胡适一生的五个阶段

耿云志 3

第二编 生平活动之部

2. 留美时期的胡适

朱文华 21

3. 胡适与《新青年》

耿云志 46

4. 知识分子与革命：北伐前后胡适政治态度之转变

罗志田 68

5. 胡适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

季维龙 116

6. 胡适与《独立评论》

胡 明 145

7. 七七事变后胡适对日态度的改变

耿云志 184

8. 胡适与抗战

2 · 胡适评传

耿云志	198
9. 胡适与北京大学	
欧阳哲生	217
10. 胡适的暗淡岁月	
周质平	245
11. 谈胡适之先生最后四年的生活	
陈雪屏	270

第三编 思想学术之部

12. 胡适与文学革命	
旷新年	283
13. 从胡适与梅光迪的争论看文学革命的时代意义	
耿云志	332
14. 胡适的新红学及其得失	
周策纵	363
15. 胡适与实用主义	
杨国荣	391
16. 胡适的史学	
吕实强	441
17. 胡适与中国新教育	
吴二持	482
18. 胡适禅宗史研究平议	
楼宇烈	501
19. 胡适重审《水经注》学术公案	
方利山	519
20. 胡适与《水经注》	
陈桥驿	542

21. 论胡适的文化心态形成的背景及其特点	
耿云志	566
22. 胡适之先生的抗议与容忍	
周策纵	587
附录一 胡适论著举要	625
附录二 胡适研究论著举要	627
后 记	629

第一编

综 论

胡适一生的五个阶段

耿云志

胡适是现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学者之一，同时也是争议最多的人物之一。他生前已是“誉满天下，谤满天下”，死后则“功罪盖棺犹未定”。在大陆更有持续数年的大批判，以致在很长一个时期里，他的名字只有在被批判、被诅咒的时候才会被提起。胡适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几乎无人知道了。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局面终于改变，一些学者不为成见所蔽，从搜集材料、研究材料做起，逐步揭示出胡适的本来面目。如今单是在大陆，关于胡适的传记性著作就有十来种，专题研究论著亦有数种，海外研究胡适的著作，凡比较有价值的，都已翻译成中文出版。胡适本人的著作也以各种形式一版再版，其名目之多，流传之广，几乎超过了胡适生前盛名远播的时期。这大概也是一种物极必反的现象吧。过去胡适被歪曲、被丑化得太厉害了，现在人们要了解真历史、要认识一个真胡适，就是很自然的了。

胡适的一生相当复杂，他的活动、他的成就、他的影响都是多方面的。我们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大体上主要还是致力于还其本来面目。从各个方面更深入地做专题研究，在此基础上，将

胡适多姿多彩的一生同他所处的那个充满动荡的大时代紧密联系起来,作出综合的研究,这是今后仍须努力的。

由于非常明显的原因,研究胡适的材料没有及早加以搜集、保存和整理,许多宝贵的资料不免散失了。尽管如此,资料还是很丰富的,有些还没有被充分利用。其中最大宗的有《胡适手稿》(十集 30 册)、《胡适的日记》(影印 18 册)、《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影印 42 册)。充分利用这些资料,胡适研究应可有进一步的成績。

本书是集海内外研究胡适的专家所写的专题论文而成,因受篇幅的限制,不能涉及胡适所有重要的方面,为了稍作弥补,我想在这里先对胡适一生作一简括的概述。

胡适(1891—1962)的一生,除少年期外,可分作五个阶段:准备期(1910—1917),开创期(1917—1926),稳定期(1926—1937),动荡期(1937—1949),晚年(1949—1962)。

一 准备期(1910—1917)

本来,胡适在上海读书,特别是主编《竞业旬报》,亦可划入准备期。但仔细分析上海时期的胡适,尽管比一般少年早熟,文字已打下了初步的基础,然而却远没有开创自己人生道路、做一番大事业的自觉意识。他当时既没有选定自己事业的方向,也没有有计划的准备。正因如此,当中国新公学解散、自己孑然一身独立谋生时,竟不免陷于堕落。所谓准备,一定是有目标、有相当的自觉性的努力过程。以此为标准,上海读书时期,还不能算是胡适人生的准备期,而应从 1910 年考取留美官费生赴美留学算起。

经过最初的一段择业的确定和对生活环境的适应过程之

后,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逐渐明确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他准备要做“国人之导师”。他要在思想学问等各方面准备条件,他特别注重求得一种健全的思想方法,在当时的美国,他找到了杜威的实验主义做自己的哲学基础。他认识到中国所处的际遇环境,中国人面临最根本性的课题,是尽可能地使中西文化相协调、相结合,使中国古老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成分获得新生命。也就是说中国需要有一个类似西方文艺复兴那样的一个文化更新过程。他认定自己的历史使命就是在这个文化更新过程中充当一个开路的工人。在留学的最后两年,胡适竟找到了中国文化更新的入口处——以白话文学代替古文文学的文学革命。这是他实验主义哲学的第一个实验园地,也是他为中国文化更新的奠基工程。

二 开创期(1917—1926)

胡适于1917年回国前,关于文学革命他已经过了充分讨论和酝酿的阶段,并已开始创作白话诗的尝试。但他文学革命的第一篇正式宣言《文学改良刍议》,是1917年1月在国内的《新青年》上发表的,尽管这个尚未归国的留学生的文章,其口气相当谦逊、温和,但文学革命的最中心的课题——以白话取代言言的正统地位——已明白宣布出来。而后来全国纷纷扬扬的讨论也正是围绕这一中心课题展开的。诚然,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无疑地使这场争论更加具有革命的色彩。

胡适回国后,即与《新青年》的创办人、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陈独秀成为亲密同事。以他们两人为核心,以蔡元培领导的北京大学为基地,很快形成了包括许多留学归国的青年学者在内的一批以开创新文化为己任的进步知识分子群。《新青年》即是

他们发表言论的中心阵地。回国后的胡适为文学革命提出了新的口号：“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并继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一时成为创作新文学、创作新诗的轨范。因为顺应时代之潮流和人群之需要，文学革命迅速取得了不容置疑的胜利。中国固有的几本白话小说，如《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等等都一下子成了家喻户晓之书，都成了帮助推广白话文学的典范之作。随之，一大批用白话创作的新文学作品纷纷出世，连古文家最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学园地——诗歌的创作，也逐渐为白话诗让出了地盘。但文学革命的成功，其意义却远远不限于文学自身的范围。因为白话文学的盛行，逐渐形成了白话的新国语，使亿万人民得了一种最方便的和表达思想的新工具，从而带动了教育革命和思想革命，大大推动了新文化运动，有识之士都看到了它的社会解放的作用。著名的革命党领袖廖仲恺曾略带夸张地对胡适说：“先生鼓吹白话文学，于文章界兴一革命，使思想能藉文字之媒介传于各级社会，以为所造福德，较孔孟大且十倍。”（《廖仲恺致胡适信》[1919年7月19日]，见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8册，第401页）

新文化运动最中心的内容还是人的解放。这是走出中世纪，建立现代社会最基本的课题。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他的最大贡献亦在于此。很长时期以来，人们从表面观察，只看到他倡导白话国语的作用，非他人可比。实际上，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搞文学革命，倡导白话的新国语，只是他进行文化革新的切入点。在整个新文化运动中，他最为坚持一贯而又用力最多的是确立一种新的价值观。他在解释新文化运动宗旨的一篇文章里，明确提出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样一种根本的态度。新价值观最核心的问题是“个人的发现”，即重新确

立个人的价值。在中国，自从孟子大骂杨朱、墨翟以来，中国历代统治者及正统士大夫皆提倡敬天法祖，尊君崇圣，一概抹杀个人。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其尊重个人的精神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于是守旧的士大夫也学孟子的口吻，斥西方文化为洪水猛兽。但既为洪水，也就只可疏导不可阻挡。到了新文化运动中，尤其是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刺激了中国一切有识之士，特别是一代有志青年，他们要担当起救国的责任，首先要从一切腐朽教条的桎梏中救出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独立有为的个人。胡适及时地提出了“个性解放”的口号，并第一个明确地解说了个人主义的真正意义。他指出，真的个人主义即是个性主义。个性主义的真谛，“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利害”。（《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胡适文存》卷四第 174 页，亚东图书馆 1925 年版）为了照顾国情，他把这样的“个人主义”叫做“健全的个人主义”，以有别于腐旧头脑对个人主义的种种曲解。胡适认为如果抹杀个性，否定个人，社会就没有生机。但如果个人不能对自己的言论行为完全地负责任，那社会就将陷入混乱。所以他强调“个人若没有自由权，又不负责任，便和做奴隶一样”，（《易卜生主义》，《胡适文存》卷四第 36 页）“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第 635 页）他把个人的解放，与现代社会、现代国家的确立紧密联系起来。在同时代人中，没有别人这样清楚地提出和界定个人主义，也没有人这样明确地把个人的解放与建设现代自由民主国家的目标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我说，提倡个性主义，努力解放个人，才是胡适对现代中国的文化更新

所做的最大贡献。

由于提倡个性主义,解放个人,自然地强化了清末以来女子解放的运动,也正是由于个性解放的结果,使一大批青年男女冲破家庭四壁的限制,冲决旧伦理教条的网罗,走向社会,成为独立的个人,参与种种新事业,直至投身革命。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一度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

胡适毕竟是个学者,除了启蒙思想家的角色,他还有意地“为中国学术谋解放”,他要大胆采用新方法,用新眼光重新审视旧典籍,创造中国学术的新典范。这一点,他通过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和发表《〈红楼梦〉考证》等一系列重头文章而实现了。蔡元培对《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评价早已是学界熟知的了。后来的中国哲学史家们,例如冯友兰,尽管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上不同于胡适,可是他们都不能不承认,胡适的著作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出发点。至于胡适的古小说考证文字,不但为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开辟新路,而且在研究方法、提出新的范式,启迪了一代青年学子。著名的古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就是受了《〈水浒传〉考证》的启发而开始其疑古辨伪的工作的。后来到抗战时期,陈寅恪曾对人说,胡适之的小说考证文字,至今无人可比。其典范性不容置疑。

胡适在其一生事业的开创期主要做了三件事:文学革命、思想革命和学术创新。这三件事对于现代中国都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三 稳定期(1926—1937)

1926年7月,胡适为中英庚款的事远游欧洲,后又到了美国,1927年5月才回国。这时,国内政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胡适这个自由主义者既不为北方旧势力所容,也不为南方的国民党当局所认同。他在上海过了一段较为清闲的日子,出版了《白话文学史》,写出了《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整理禅宗史料,出版了《神会和尚遗集》。这是他自认为学术上很有收获的时期,然而在政治方面却经历了一段波折。

原因是这样的。胡适对国民革命和国民党原抱有很大的期望。可是回国经过两年的观察,他发现国民党及其政权甚少民主和革新的气象,却在“革命”的名义下,实施种种专制的手段,不惜大规模地残杀异己。胡适感到无法忍受。于是他在《新月》杂志上接连发表文章,激烈抨击国民党,并批判他们反对新文化的反动倾向。这大大激怒了蒋介石和国民党人,引起他们的围攻和打压,持续了一年多才渐渐平息下来。最后胡适表示,他批评国民党本来并无恶意,“只是希望他们自身改善”。这可算是胡适与国民党政权的一段磨合期。

1930年11月,胡适举家迁回北平,重新回到他一直眷恋的北京大学。从1932年起,他担任了文学院院长,成为校长蒋梦麟的得力帮手。九一八事变后,胡适同情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从此,他成了国民党政府的“净臣”和“净友”。通过他自己主持创办的《独立评论》,经常发表时评和讨论政治的文章。这时,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一些胡适的学生,有的,如罗家伦等已在国民党政权中占一席之地;有的,如傅斯年、顾颉刚等都已成为有影响的学者。胡适的地位自然水涨船高,俨然成了朝野敬重的首席学者,知识界不争的领袖。胡适作为中基会(管理美国退还庚款的机构,全称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董事和秘书,也大大加强了他在学术文化界的影响力。因为此会掌管着一笔相当可观的经费,可以补助中美学术文化交流,派遣留学生,交换学者,还可以补助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等等。

胡适在会中能得到中美双方董事的信任和尊重,最能协调会中各种不同意见,所以圈内人皆知,胡适是中基会的灵魂。

胡适这时领导着两项影响很大的学术工作:一是从20年代前期即已开始的“整理国故”;一是主持中基会属下的编译委员会,有计划有系统地翻译西书。整理国故是借鉴西方的学术方法整理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重新发现其价值。在胡适看来,这是建设新文化必要的基础工程。至于翻译西书,其意义更为明显。这两项工作,因国家的不安定而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胡适返北大后,尽管国民党政权有内外交困之窘,但胡适本人的生活毕竟相对安定,所以在学术上仍取得不少成就。首先应该提到的是他的《说儒》。这篇五万字的长文,系统论述了儒的起源、儒者的社会角色和孔子对儒学的大贡献。尽管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学者有不同意见,但谁都无法否认这篇文章的学术价值。有一些未做深入研究而轻发议论的人,声称胡适改变了五四以来对儒学和孔子的看法,说他思想不能一贯。这是很轻浮的批评。五四时期的胡适从未否定儒学的历史地位,更从未否定孔子的历史地位。其《中国哲学史大纲》可以为证。人们说胡适“反孔”云云,不过是根据他在《吴虞文录序》中所提到“打孔家店”一句话。稍能思考的人皆能懂得“孔家店”≠孔子,“孔家店”≠儒学。“孔家店”者何?官营“孔家店”是专以朱熹注“四书五经”一家之言,牢笼天下士子,售其“尊君卑臣”、主敬主静、修养心性等一套说词。民营的“孔家店”,几乎到处都是,渗透民间社会,只能造就“孝子”、“烈妇”;对人民开其智慧不足,而窒其性灵有余;是压抑社会生机,阻碍社会进步的一大魔障。无论官营的、民营的,“孔家店”皆该打倒。孔子及其弟子不能为身后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事情负责。所以,孔子是孔子,儒学是儒学,而“孔家店”则别为一物,打倒“孔家店”,与

孔子、儒学无涉，以评判的态度研究孔子、研究儒学，五四以前有之，五四以后有之，21 世纪仍当有之。《说儒》一文表明胡适这样一位有双重教育文化背景的知识分子，对待中国文化遗产一种非常敬慎、非常严肃的态度。所谓胡适“否定一切传统”之说，是没有根据的。

这一时期，胡适继续写了多篇古小说考证文字，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醒世姻缘传〉考证》，这是胡适颇引为得意之作。罗尔纲先生也认为这是胡适小说考证文字中“最佳的一篇”。（《胡适研究丛刊》第一辑第 130 页）其所以最佳，是因为可供研究的材料太少。胡适仅根据《醒世姻缘传》的情节与《聊斋志异》中《江城》一篇的情节绝相类似这一极简单的线索，大胆提出假设，认为《醒世姻缘传》的作者可能就是蒲松龄或者是他的朋友。然后他“上穷碧落下黄泉”，处处小心求证，终于得到圆满的答案，不但求证出作者“西周生”原来就是《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而且求证出其小说人物的原型就是蒲松龄的朋友王鹿瞻。这篇考证文字是他“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治学方法的最具体的体现。但与《〈红楼梦〉考证》、《〈水浒传〉考证》相比，其学术意义与社会意义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此时期，有关中西文化的论争，是不能不提到的。本来，这种争论几乎如影随形地伴随了胡适的一生。但 30 年代的这场争论，因为双方旗帜更为鲜明，问题也更为集中，胡适参与得也更为直接，并且因为他曾用了一个不太确切的字眼“Wholesale Westernization”（可译为“全盘西化”），遂长期被认为是“全盘西化论”者。所以这一争论与胡适关系至为密切。

事情是这样的。1929 年，胡适为上海的《中国基督教年鉴》（China Christian Yearbook. 1929）写了《文化的冲突》（胡适又自译作《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Conflict of Cultures）一文，中心意思

是批评折衷主义地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指出那不过是变相的保守主义,主张要“Wholesale Westernization”或“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前者可译为“全盘西化”,后者可译为“一心一意的现代化”或“充分的现代化”。当时和今天差不多,留心阅读英文杂志的人毕竟少数,所以此文未引起大的反响。只有潘光旦读此文后,写过一篇书评,指出胡适用的两个英文词,意义是不一样的,他能同意后一提法,而不能接受前一提法。到了1935年1月,具有国民党背景的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是很典型的折衷主义的主张。当即有陈序经著文加以批评,明确主张“全盘西化”。这时胡适尚在南方。回北平后,他先在他主持的《独立评论》第142号的《编者后记》中声明:“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的新文化。”到了3月底,胡适发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批评十教授的主张“是今日一般反动空气的一种最时髦的表现”。同时正面阐述自己的文化主张。除了指出文化自身皆有惰性,因而文化接触引起的变化不可能毁灭一种文化的根本基础之外,又强调,所谓文化本位,实际就是那无数无数的人民,这个本位是不会被毁灭的。同时指出:在文化的大变动中,不可能有一种可靠地用以指导整个文化各方面选择去取的标准,只有让我们的老文化与世界的新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这样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两个多月后,他又发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郑重声明,为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争论,他愿意放弃“全盘西化”的提法,而采用“充分世界化”的提法。但“充分世界化”的提法仍是不圆满的,照样可有不同的解释。只是至少可以说明,把胡适说成是“全盘西化论”者显然是不恰当的。当年参与争论的陈序经就不承认胡适是“全盘西化论”者,而是某种

程度的折衷论者。总起来看,胡适关于文化的选择不应主观设定标准,应在文化接触引起的变动中,求得建设新文化的结果;关于文化本位存在于无数无数的人民之中,坚信这个文化本位是不会毁灭的等等思想,是正确的,这既表明他在文化上的开放态度,也表明他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的自信心。

自从 1932 年 5 月,胡适在他一群朋友们的鼓动下创刊《独立评论》,谈论政治的兴趣再度浓厚起来。除了对外交(主要是对日问题)、内政、教育和思想界的倾向时常发表评论外,还一度集中地讨论过民主与独裁的问题。这场讨论比过去历次思想界有关此一问题的讨论都更为集中、更为深入,意见也更为明确。胡适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在这场讨论中,他发表了讨论民主的文章有 17 篇之多。他始终一贯地坚持认为,中国应该走民主政治的路,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他很有创见地提出了民主政治其实是“幼稚园的政治”。许多人表示不解,甚至嘲笑他不懂民主政治。胡适所以提出此一见解,是有鉴于相当多的人认为中国人程度低,经济、教育落后,难以实行民主,只能实行专制。胡适说,民主政治其实正适合于程度低的人民练习政治生活的需要,是“幼稚园的政治”。胡适这话固然有毛病,但绝非毫无道理。民主是一个历史过程,不能主观设定一个标准,到什么程度才可以行民主,不到那个程度就决不可行民主。民主既然有一个从低到高、从简到繁、从粗到精的发展过程,那么,只要大多数人已觉悟到民主制度是可取的,就不妨开始向民主的路上走。起点不妨很低,制度不妨简单,但只要是朝向民主发展,那就不同于专制政治,就是在建设和发展民主政治,也就是实行民主政治。应该说,胡适的见解对于中国人具有特别的启蒙意义。因为如果不这样看问题的话,民主政治就高不可攀,就被推向遥远不可知的将来,中国人就只有永远甘受专